

# 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之自覺及國語運動

王爾敏

## 一、引言

二、富強啓念及語文改良先驅

三、本土化與普及觀念

四、國語運動及其演變

甲、推行機構之創設

乙、觀念之演變

五、結論

## 一、引言

中國近代承受西方衝擊，產生全面震撼。凡此一中華民族之整體歷史文化，思想信仰，風俗習慣，語言文字，種類血緣，無不發生根本動搖。而在民族信心上，投注濃厚陰影，充滿疑慮焦灼、猶豫厭惡，乃至於自怨自恨，自我攻伐，已至於民族信心崩潰，實為創古所未見，亦正顯示國力之衰竭，民族生命陷於掙扎生死存亡之間。

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官紳士庶，謀求自救自存，殆至發言盈廷，莫衷一是。正所謂百家爭鳴，醫方亂投，亦顯示救亡之情勢緊迫，彷徨莫知所措。

中國近代之最大危機，莫過於信心崩潰，尤莫過於知識分子之思想混亂，喪失信持。此種表現，真當瀕於魚爛而亡境界。內在之信心崩潰，尤反映於自虐自毀，當不待列強壓迫，帝國主義之分割，亦必羣趨於毀滅之途，乃真正是亡國滅種徵兆。

近代西方衝擊，中國應付顛倒錯亂，澈底失敗。漸使知識分子完全陷於失望自卑，悲觀無助狀態。檢討反省，對於本民族一切過去，無不產生根本懷疑與澈底否

定。馴至詛咒破壞，惟恐不力。此一澈底否定之思想動力，瀰漫而浸澈至於各種問題之上。最嚴重至於對於「中國」國名之懷疑批判，對於中國民族種性來源之懷疑批判，對於中國文化生成根源之懷疑批判<sup>①</sup>。凡此種種思想意念，決未發生於歷代任何時期，獨於近代成為可疑問題。當然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之心理狀態，已達於信心動搖，無從自解境地。同時這種思想動力也浸澈至於中國的語言文字。

中國近百年語言文字也在西方衝擊之下，承受極大震撼。自十九世紀末以迄現代，發生許多周折，宗旨起伏轉變甚大。正如中國民族本身，要渡過嚴酷折磨改造，或能一旦復甦，或將永遠死去，迄今尚難逆料。不過就思想史上可以確定其起始意義，並能提具全面參考。在此作一審慎研討，自較單就語言文字本身之改造更具重大意義。

在此必須交代明白：其一，在創造啟念方面，多半是基於求好求善求有效求完美之原始動機。不過這一動機又必先假定原有一切之不善無效與不完美。其二，在批評與檢討方面，一定要做到破壞、廢除與改造一些事體。大致必會達到某種程度；當然亦必建立創生某些事體，同樣亦將達於某種程度。其三，在一切進行之中，決不可能直線進行，必有一些蜿蜒迂曲之若干周折。甚至於在發展過程之中，亦不免於歧路亡羊的後果。惟本文宗旨，正為此三項前提，而充滿研討興趣。

百年來中國語文學家著書立說，發行報刊，討論中國語言文字問題，可以說洋洋大觀，很具規模。除古文字語法之外，就今日中國民族現用語言文字而言，也是討論最多，意見最雜，震撼最烈。我們不必再陷入這些專家範圍內參與爭論，亦無庸多作一分語文本身之分析。因為前人已在專門問題上做得很多，只是迄今並無一人討論到形成近代這種熱潮之思想背景，這卻是我們今日所需要了解者。

近代語文問題，原是啟於近代思想醒覺之一枝方向。始於嚴肅之反省，源於正當之需要。惟經種種轉折，產生多彩多姿之變化，早與思想根源脫離，而自成一項專門學術。近代人才輩出，但是並不知是承此思想動力而來。本文所以必須研究探討，因為這是思想史上之一環，在近代思想上不能省略不論。

百年來一代一代語文學家，從事研究，發佈著述，自是在學術上表現功力識見，並具一定意義。不過後世之盛況實根於前代之創始經營；而前代之創始起步，又為一種思想理念所推動；而這種思想理念之形成，則是由於時代之刺激、外力之

① 此處簡略提示各點，並非無的放矢，實早有留心，並著文討論，可參看拙文：「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」，及「中西學源流說所反映之文化心理趨向」。

衝擊種種痛苦醒覺中得來。在此討論，當不盡關涉語文本身，而是在謀求探明一些思想動力。

須知後世之國語運動，注音符號，以至於文字改革等等活動，並非憑空出現一種學術門類，其原始實啟於嚴肅之思想認識。當外力衝擊劇烈，有識之士，各思所以救國利民，足以適應世界存立自保之方。一般趨勢，無不重視於力求國家富強，自是形成思想主流。然致富強之種種入手，則又各有不同思慮，不同用心，不同設計。正是所謂一致而百慮，實質上更有過之。

中國近代思潮，在諸般思想之中，有一枝注意到中國全民醒覺問題。自甲午戰後，日漸重要。中國知識分子先知先覺之士，醒悟到有責任喚起民眾，共同拯救國家危亡。此一動機之下，遂展開種種活動與努力。一枝趨向於民生問題，因而開拓出農業改良思想。一枝趨向於民權問題，因而開拓出民主、立憲與革命等等運動。但在基本上，尤其重要者則為民眾知識問題。若不提高民眾知識，一切努力將必落空。思考及於中國民眾知識之提高，自然即引發知識普及化之醒覺。而先其所急，無過於語言文字之普及，使民眾得以迅速獲得知識，自為切實有效途徑。由此基本認識所啟示，隨後即進入於語文普及思考之中，並輾轉形成百年來之各種語文改良活動。

## 二、富強啓念及語文改良先驅

中國近代語文改良觀念，啟於知識普及下層民眾之自覺，原始宗旨，在求喚醒民眾，救助國家，實出於崇高理想與正大理由。動機之起始，導因於中日甲午戰爭，中國慘敗，割地賠款，訂立不平等條約，中國自此更陷入國際分割之深淵。列強瓜分呼聲，尤其驚心動魄。語文改良觀念即亦備為救亡圖存之一種主張，自此展開對國人之倡導呼喚。

馬關條約訂立不久，盧憲章即提出其語文改良之救國主張。撰著：「變通推原說」，提議其創制切音文字之理論，而其根本重大原則，即在使國家強盛：

「國家之所以興者，由於精也；而所以不逮興者，由於苟也。何謂精？細微之事，人所易忽者，彼則不敢以輕心掉之，事事必窮其底蘊。人以為迂且愚，殊不知驚天動地之舉，莫不由至細至微而致也。試觀小子甫能言，則知一而十等數，至淺顯也。然擴而充之，其理彌於六合。小而居家商賈所必

需，大爲格致化學之樞紐，由是而生出新奇巧妙之機器，造出千萬利國益民之事物，此國家之所以不期興而自興矣。苟者曰：此淺顯之事，非吾儒之所當講求也。於是事攻於太古元妙之事，而苟且於日用尋常之理，出口則古聖先王。若問其秤衡之點，呴呴之法，平常之算，則茫乎莫解。何也？志大言夸，學非所用，偷安苟且，階之屬也。捨易求難，近而忽也。此國家之所以欲興，而不遽興矣。茲將去其苟，而擇其精，當如何而後可？曰：君精而臣苟不可，官精而民苟不可，男精而女苟不可，老精而幼苟不可，士精而農工商苟不可。務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，並不論士農工商，男女老幼，遍國中無一不讀書至精而後可。」<sup>②</sup>

盧氏主張普及民人讀書，以致國家於強盛，歸宿其入手則取傳授切音字之一途，如其所論：

「吾與又何能遍國中之君臣民牧，士農工商，男女老幼，皆讀書至精也哉。夫君，猶首領也。官，猶四肢也。民，猶百體也。精，猶血脈也。倘祇君臣精而百姓苟，不亦如首領四肢活動，而百體癱瘓，何能血脈貫通，罔不從令也哉。是故君出令，官行令，民從令，皆當一體均精。有呼應之靈，而無違背之失。斯上下一體，血脈流通，而全體康強矣。誠如是也，以中國之大，人民之眾，地利之美，不數年而強莫與京矣。夫遍國中無一不當讀書至精，而中國字又爲天下之字之最難者。然則如之何其可也？曰：有一至細至微之法在，能爲變通中國之大急務、大要領。其法維何？曰：當設一種至靈至簡至淺至易之切音新字也。」<sup>③</sup>

盧憲章自從發布「變通推原說」於報章之後，在嗣後一年間又在《萬國公報》續增三次，均用同一論題，而另設分章小題，反復說明推行切音新字之要義，辯說議論，十分詳盡，其中特就日本近世之崛興作爲借喻<sup>④</sup>。盧氏最後申言推廣宗旨，志在謀求國家富強，並略敍經營之經歷：

② 萬國公報，月刊，第七十八卷，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刊，總頁次一五三四一頁，盧憲章：「變通推原說——用切音字使通國人讀書無一不精」。

③ 同前書：第一五三四二——一五三四三頁。盧文之後，萬國公報編者附志云：「鄙意：中國人識字讀書，極宜求一簡便之法，以期童子入塾後，四五年內，即可通曉文義。俾得騰出暇日，多求有用諸學。盧君此說，先獲我心。特未知如是云云，果屬法之至美者乎，抑別有良法以駕其上乎。爲錄於報，以資不如識一個字者。」（按此時主編仍爲林樂知而主編則爲蔡爾康。）

④ 盧憲章所論之二續三續四續，分載於《萬國公報》八十一卷，八十二卷及八十五卷。總頁次爲一五五三九——一五四一；一五六〇七——一五六一〇；一五八——一五八一七。

「前余撰『變通推原說』，以中國須得切音新字，為振興學校之具，立富強之原。稿凡四上，蒙貴館採取錄登。余本有志續作幾篇，無如世事繁冗，有志未逮，愧甚赧甚。邇來疊接中西同志諸君手諭，命余呈獻拙作。使余難安。余自二十五六歲至今四十三歲。晝夜專心致意，撰作中國切音新字。無非欲華人識字日多，以救貧弱。此余之所以勤勤懇懇，不能自己也。當此國家多事之秋，當有至簡至易之新字，俾得數旬之內，吾國之男婦老幼無不能讀書識字，以興各種之實學，斯誠變通之大原也。五十年來，中西士作切音新字者頗不乏人。或以懸賞考試之法，擇一至簡至易之字而用之，此誠大幸也。」<sup>⑤</sup>

盧憲章之知識普及觀念聯帶至於國家富強，自始至終，頗為一貫。其創制音標文字，始於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。而於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刊行其所著：「一目了然初階」（即中國切音新字廈腔），次年又刊行：「新字初階廈腔」。至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已售出二千餘冊。盧氏最初宗旨即基於國家富強之需要。故先抒其認識綱領，盧氏有謂：

「竊謂國之富強，基於格致；格致之興，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。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，基於切音為字，則字母與切法習完，凡字無師能自讀；基於字話一律，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；又基於字畫簡易，則易於習認，亦即易於著筆，省費十餘載之光陰，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、格致、化學、以及種種之實學，何患國不富強也哉？」<sup>⑥</sup>

十餘年之後，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刊印字書，仍沿其昔時觀點，信持甚堅。如盧氏所謂：

「倘吾國欲得威震環球，必須語言文字合一。務使男女老幼皆能讀書愛國。除認真頒行一種中國切音簡便字母不為功。」<sup>⑦</sup>

當可見出前賢創制改良語文所始終信持之正大宗旨，實足備為我輩今日探討參考

⑤ 萬國公報，月刊，九十三卷，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刊，總頁次一六三五五頁。盧憲章：「中國切音新字說」。

⑥ 「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」，上海，民國二十年印，第三三八頁，黎錦熙著：三十五年來之國語運動。

又，萬國公報，月刊，八十二卷，總一五六一〇頁，盧氏文云：「倘吾華欲成為大教化之強國，當如何？則曰：國家當選擇最簡最易之中國切音新字，使通國之男婦老幼不數月間無一不能讀書識字，以振興學校新聞書庫為首務也。」

⑦ 國語週刊，十二期，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刊，白滌洲撰：介紹國語運動的急先鋒——盧憲章。

⑧。

與盧氏同時，並亦早有用心從事語文改良者，則有蔡錫勇。蔡氏字毅若，福建龍溪人。幼少時在同治年間受教於廣東同文館，以成績優異而保送至京師同文館深造。卒業後，歷任駐美、日（西班牙）、祕三國使館繙譯以至於參贊。自張之洞任兩廣總督，遂引為一切洋務之執行助手。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，張氏移督湖廣，並調至湖北，先後為之創辦漢陽鐵廠、漢陽槍礮廠、湖北織布局、湖北銀元局、魚雷局、水陸師學堂、湖北武備學堂，以至辦理各項洋務交涉，可謂最為得力。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，張氏保荐有謂：「該員深通泰西語言文字，於格致、測算、機器、商務、條約、外洋各國情形政事，無不詳究精研，洵屬通達時務，體用兼賅。」<sup>⑨</sup> 蔡氏於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任官至署漢黃德道（又通稱江漢關道），而於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積勞病故<sup>⑩</sup>。惟留有「傳音快字」一書，為當世所重。

蔡氏啟念於駐美時期所見西方速記術，仿行而創其一套字母符號，稱為二十四聲者，即二十四聲符。三十二韻者，即三十二韻符。共計五十六個符號，閱其書自序，可知是承西方實例所得啟悟，茲略引證，以資參考：

「余昔隨陳荔秋（蘭彬）副憲出使美日秘三國，駐華盛頓四年。繙譯之暇，時考察其政教風俗。嘗觀其議政事，判詞訟，大庭廣眾，各持一說，反覆辯論，雜遝紛紜。事畢各散，而眾論異同，業皆傳播。紀錄稠疊，稟常盈寸。揣其必有捷法。繼詢彼都人士，始知有快字一種，行之已久。作者不一家，師承各異。」<sup>⑪</sup>

蔡錫勇所著「傳音快字」一書，有光緒二十二年自序，當知成書甚早。同時推重之者有花縣湯金銘、林輅存以及鄭觀應，其撰著宗旨，經鄭觀應申述，可見一斑。光緒二十二年，鄭氏得蔡錫勇贈書，特有覆函稱譽，略可見其書價值：

「承示大著切音新字書，較東莞王煜初（炳耀）、蘇州沈曲莊（學）所著筆畫尤簡，更易諳習。將極難極複之學業，變為極易極淺。苦心絕學，裨益世人，佩服之至。嘗考泰西人材之眾，實由字學淺而易明。我國文字繁重艱

⑧ 盧憲章字雪樵，福建同安縣古莊鄉人，生於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，卒於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享年七十五歲。曾在二十一歲時赴新嘉坡工作，並學習英文。二十五歲時回廈門。佐英國教士編纂字典，得以心創切音新字。近人白瀟洲有傳記性之介紹，載國語週刊，第十期至十二期。

⑨ 張之洞：張文襄公全集，卷三十五，奏議，第二十七頁。

⑩ 張之洞：張文襄公全集，卷四十七，奏議，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頁。

⑪ 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三四頁，所附蔡錫勇自序。

深，學習綦難，民智無從啟發。如蒙當道奏請朝廷，擇其切音易筆畫簡者，通飭各省州縣官紳，設立學堂，凡年六歲者無論貧富子女，皆須入學。一月未成，學至兩月，兩月未成，學至三月。學成之後，再學漢文。如無力再學漢文者，即譏簡字漢文蒙學五千字課圖，以備購閱。便知常用之漢文字義矣。更設新字日報小張，賣價極廉，俾廣留傳。不需數年，國內無人不識字，而民智大開，風俗日美。毋以小術輕視也。」<sup>12</sup>

蔡氏病歿後，仍爲京官林輅存於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七月「請定切音新字」稟呈中述及，由都察院轉奏朝廷：

「查創新法切音者，福建盧憲章之外，更有福建舉人力捷三、江蘇上海沈學、廣東香港王炳耀、已故前署漢海關道蔡錫勇，各有簡明字學刊行於世。其法均遵欽定康熙字典切音，參以西法，而善其變通；或以字形勝，或以音義勝，或以拆合勝。大旨以音求字，字卽成文，文卽爲言，無煩講解，人人皆能。而尤以盧憲章苦心孤詣，研究二十餘年；且其生長外洋，壯年回籍，故其所爲切音新字捷訣，深得中西音義之正。」<sup>13</sup>

並時普及知識先知學者，尙有吳縣沈學。沈氏字曲莊，又號菊莊。久居上海，通熟英文。十九歲始研製切音字書，五年而成「盛世元音」。於光緒二十二年八月起刊於「時務報」第四冊。繼後分別續刊於「時務報」十二冊、二十冊、二十七冊。全書七篇，原著爲英文本，譯成中文刊布，並附梁啟超序。

考察沈氏著作宗旨，同樣以謀求國家富強爲創義根本，以普及推廣知識爲達成途徑，構成改良文字原始動機，苦心孤詣，研究創制，並在上海熱心傳授世人。沈氏自序，已明晰有所表達：

「今日議時事者，非周禮復古，卽西學更新。所說如異，所志則一，莫不以變通爲懷，如官方兵法、農政、商務、製造、開礦、學校。余則以變通文字爲最先。文字者，智器也，載古今言語心思者也。文字之易難，智愚強弱之所由分也。」<sup>14</sup>

⑫ 鄭觀應：盛世危言後編，卷二，第二十三頁。

又，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三九頁，有湯金銘：「傳音快字書後」一段節錄文字。

⑬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，上海，商務，民國二十年，第三三九頁，黎錦熙文。

又，林輅存氏稟呈，僅能見及片段，其全文仍保留於清故宮摺包。近年「戊戌變法檔案史料」出版，並未選入，僅開列目錄於五一六頁。

⑭ 時務報，第四冊，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刊。「盛世元音」原序。

又，按沈學「盛世元音」，係由其英文原著譯出，原著已無從見。惟就其凡例所謂：「由爾孚三而昔司的姆」，當知其原書名爲：Universal System。

此說頗有超越羣倫識見，當時極少有人能見出復古與趨新，實歸塗如一，真爲沈氏一語道破。沈氏又云：

「自蒼頡造字，至今四千五百餘年。分字部之法有三：一事類，一音韻，一筆畫。字部多至五百四十四，至少亦二百一十四，共計字體四萬九百餘字。士人常用者惟四五千字。非誠讀十三經不得聰明，非十餘年工夫不可，人生可用者有幾次十年。因是讀書者少，融洽今古橫覽中外者更少。旣文事凌夷，外患蠭動，當此痛巨創深之際，莫不欲自強爲計。竊謂自強陳述有三：一，歐洲列國之強。羅馬失道，歐洲散爲列國，列國所以強，有羅馬之切音字也。人易於讀書，則易於明理，理明利弊分晰，上下同心，講求富強。二，美洲之強。其所以強，由歐人遷居其地，大都讀書種子。今格致富強，與歐洲並駕齊驅者，亦切音字爲之。切音字易達彼此衷曲，上下無隔膜。三，俄國日本之強。俄皇彼得，幼肄習歐洲，一切富強事，銘之心，筆之書，身登大寶，新政隆然。今天下畏之。日本通商二十載，奮然興者，勇於師也。上下莫不以呂方美興爲志，今天下敬之。二國之自強，其勢由上藉本國切音字，繙譯太西富強書，令民誦讀者也。三者莫不以切音字爲富強之源。」<sup>⑮</sup>

沈氏於其製作極具自信，議論歸宿，無不繫於求強一念，凡再三申述：

「天下無不可考之理，無不能爲之事。余闡詳體用，得盛世元音十八筆字母，可公天下，能切天下音，兼分文理音同義異之字，以譯漢文洋文書籍。音義不爽累黍，以十八筆爲階，八下鐘可以盡學。寫讀之疾省，製作之美備，古今未曾有也。一載通國皆能誦讀有用之書，三年遍地盡屬有用之人，得文字之捷徑，爲自強之源頭，同文之盛，殆將見之矣。」<sup>⑯</sup>

盧憲章與沈學同在光緒二十二年分別刊登著作於「萬國公報」及「時務報」。沈氏樂見同道，並於同年九月見及盧氏切音新字書。因是通函榷商，凡三致書，未得回音。終於將第三函送刊「萬國公報」第九十八卷，詳論字學義旨，極具熱忱與自信。就函中所見，則知沈氏在上海一隅已傳授數萬人，真乃有心傳道之士。可惜始終未見盧憲章之回音<sup>⑰</sup>。

⑮ 同前註。

⑯ 同前註。

⑰ 萬國公報，月刊，九十八卷，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刊，總頁次一六七四八至一六七五〇頁，「致盧憲章第三函」，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寄於上海虹口同仁醫院。

沈氏生於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，卒於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受教於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學校，學習醫科，西學根柢全種於此。故其著作原爲英文，而節譯以成「盛世元音」一書，尚不及原著之半。後來又有增訂成「拼音新字」書，光緒二十五年在上海出版。觀其以同仁醫院爲通迅地址，當知服務於此，與西洋教士頗有淵源。又據黎錦熙文，謂沈氏晚年貧困潦倒，流爲乞丐而卒。人才不遇，令人痛惜惋嘆不已<sup>⑯</sup>。

沈氏以外，尚須一論梁啟超之識見。梁氏雖未自創音書，改良語文，然其時代認識則與諸家同調。尤其現代人之言語音史者，原始頗承梁氏提示途徑。梁氏宗旨亦自國家富強起義。如其序沈氏音書：

「國惡乎強，民智斯國強矣；民惡乎智，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，斯民智矣。德美二國，其民百人中識字者殆九十六七人。歐西諸國稱是。日本百人中識字者亦八十餘人。中國以文明號于五洲，而百人中識字者不及三十人。雖曰學校未昌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。吾鄉黃君公度（遵憲）之言曰：語言與文字離，則通文者少；語言與字文合，則通文者多。中國文字，多有一字而兼數音，則審音也難。有一音而具數字，則擇字也難。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，則識字也又難。（日本國志三十三）嗚呼！華民識字之希，毋亦以此乎。」<sup>⑰</sup>

梁氏頗推重沈學著作，對其言論，尤稱賞其通達透澈，發前人所未發，的爲知言之論：

「余於盧君（翹章）書未得見，蔡（錫勇）沈二家，則其法略同。蓋皆出於西人。或沈君更神而明之，有所得歟。然吾之寡學，終無以測諸君之短長也。沈君以年少，覃心絕藝，思以所學易天下。常以西人安息日，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樓，挾技以待來者而授焉，其亦有古人強聒不舍之風乎。沈君屬以書入報中，其書文筆未盡雅馴，質家之言固如是，不能備求也。至其言論，多有透闢銳達爲前人所未言者。嗚呼！不可謂非才士也已。」<sup>⑱</sup>

語文改良先驅學者，同時期尚有香港紳士王炳耀。王氏字煜初，廣東東莞人，久居香港，篤信基督教，並任傳教牧師。因其熟習英文，啟悟思緒，另創簡易拼音

<sup>⑯</sup>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，第三四二頁。

<sup>⑰</sup> 時務報，第四冊。

<sup>⑱</sup> 同前註。

字母，俱仿英文字母發音部位，分別各地方言，草創簡單字畫聲母韻母。在光緒二十二年著成「拼音字譜」一書，公之於世。英文名稱是 *Cantonese Method*。是年仲秋所撰自序，申明創作宗旨。正亦充分表達謀求國家富強之動機：

「今欲興中國，而專求歐美二洲之鐵路、機器、技藝、礦務、商務、銀行、郵政、軍械、戰艦，不務去偽之道，誘善之方，智民之術，興強無基，而羸弱反日深。前車之鑒豈遠哉！夫泰西之強，先本於上下誠、男女學也。捨此不求，徒效外美，何異於栽花插瓶，目前香豔。若卓識之臣，憬然悟之，思設學堂以求西法，立報館以啟民心，可云務本之道。然化俗無方，虛偽如故矣；方言無字，民昧如故矣。僕抱杞人之憂，設精衛之想，妄擬新字拼切方言，字母比之泰西，書法依乎本國。拙者習之，旬日卒業，簡莫如也。是書拼音成字，書出口之音，運之入心。不由耳而由目，使目見者即明。猶以口宣言，使耳聞者即達聲入心，通別無難義也。各字讀法，先聲母後韻母，由左至右，自上而下。或先大後小，按音拼成，有識之士，虛心推行，始於家，繼而鄉，漸而國。合國爲家，天下莫強焉。」<sup>②</sup>

同時英國教士李提摩太 (Rev. Timothy Richard) 亦著文推薦，略可見王氏著作背景及其創製依據之處：

「中國自海禁大開，內地人得與泰西各國往來，其間能通西國語言文字者頗不乏人。習見泰西文字之易學，而後知中國文字之繁難。讀書者費十年之功，而猶不能盡識羣書之字。且形體雜出不同。泰西以字母拼成，有一定不移之法。此中國文字之所以難也。今中國之通西文者，曾有人倣泰西以音拼字之意，別創法門，如東莞王炳耀著拼音字譜一書，以簡馭繁，於西文之外另闢形像。」<sup>②</sup>

早期語文改良先驅，尚有力捷三其人，亦見於光緒二十四年林輅存稟呈所敍。力氏字子薇，福建永泰人，光緒甲午年舉人，曾於光緒二十二年刊印其著作「閩腔快字」，後又於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出版其「無師自通切音官話書」。惟其

② 萬國公報，月刊，第一百一十四卷，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刊。總頁次一七八四五頁。

又，按王炳耀爲香港開埠後第二代地方紳士，身在遠洋，而關心國家前途，留心國家富強事業。並爲早期對英政府提出禁販鴉片之重要地方領袖。於中國自強變法思想，亦爲時代先驅。其子王寵惠倡導革命，勵業彪炳，著聲當世。益見王氏身教啓牖之功。

② 同前書，總頁次一七八四四頁。

又，按同書第一七八四六頁，附有王氏拼音字母圖樣，純爲設計符號，雖簡易而太過雷同，恐亦不便區別。

著作內容，今已難於查考。僅可就他人敍論，間接略窺大要。力氏著作借取蔡錫勇「傳音快字」體製，而充實福建舊有之「戚林八音」，即所謂戚參軍（繼光）之十五聲母，以每聲一筆為基礎，再以圈、點、橫、斜、曲、直記號分別三十三韻。配於每一聲母，即可發音。至於力氏究係基於何項動機而從事著作，則已無法得知<sup>23</sup>。

統觀以上五位語文改良先驅，不約而同，各人均在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亦即丙申年發布其著作，似是巧合，實則正為承受中日甲午戰爭之巨大衝擊，有識之士，已深感危亡迫在眉睫，謀所以自立自存，惟有共圖富強。欲共圖富強，又不能不喚起民眾，結合羣力。欲喚起民眾，使人民共抒建國智能，自須使眾民先有知識有技能。然富強技藝，俱以西方科技為入手，若欲迅速求得，自必當先灌輸人民最新知識。於是語文工具，首先必須健全而簡易，因是普及知識實為當時知識分子醒覺後急求達成之重大目標，語文改良則是達成此項目標之必要手段。概括而言，先驅學者創制語文工具，實基於嚴肅之思考，並承擔重大之使命。在此倡議之初，所表現之思潮中心，一為謀求國家富強，一為求知識普及。五位先驅學者之言論，除力捷三著作無從採輯者外，其餘四人均已可充分參證其所抒意見。適足反映同時代知識分子百慮一致，諮詢僉同，極具思想史之意義與價值，真值得後人參考比較。

其次一現象，亦頗具研討興味。五位倡導先驅，除力捷三一人外，其餘四人均受新式教育或西方教育，並通熟英文。盧憲章是基督教徒，受西式教育於新嘉坡。返廈門之後，又隨英國教士麥嘉湖（John MacGowan）助理編輯英華字典。蔡錫勇幼少受教於同文館，研讀外語至少八年，而後隨使美國，亦為深熟英文之人。沈學少年受學於上海聖約翰學校（後之聖約翰大學），服役於同仁醫院。其著作先成英文本，後譯成漢文。當然精通西方文字。王炳耀為香港早期基督教徒，久服務於教會，受西洋教士薰陶，並亦熟知英文。由此可見一種新式教育，自必具有啟發新思潮之功能，並能醞釀而創生新思想。

由前一問題引伸至另一現象，即五位倡導先驅所有語文製作，俱受西文體系啟導，因革而創出新制，無一例外。當知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教育，自必承受其相當影響，其思維導向，自然易以所熟習之西方方法規制為因循模型。

<sup>23</sup> 國語週刊，第四十七期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刊。尹耕撰：「注音符號公布前之簡字運動」。

再由以上諸問題而獲一結論，是即在文化接觸醞釀階段，承受新式教育之人，覺悟迅速，亦必自然承擔中間橋樑使命，且將成為創發新文化之功臣。

### 三、本土化與知識普及觀念

近人黎錦熙著「國語運動史綱」，將最早時期之先驅創制，稱為是「切音運動時期」，約指在一九〇〇年以前。接續而有新發展，黎氏則稱為「簡字運動時期」。其下尚有第三第四各時期之命名<sup>②</sup>。黎氏是第三代國語運動領袖，並是語言學專家，純就制度形式立說，顯而易見，最能服人。但此學術創制，並不能反映其根源之思想變化。抑且所言簡字運動，在今日尤易產生誤解。或以為是推動全面簡體字之運動，則是全然大錯。黎氏所謂之簡字運動，仍為創造一種字母，因為仿照日本片假名，取漢字最簡筆畫或偏旁，另創一組字母，俾作拼音之用。黎氏之稱為簡字運動，是反映當時論點。因為是創制字母之人習慣所用，當時普遍稱之為簡字，如「簡字全譜」、「京音簡字述略」、「讀音簡字通譜」等書即是。

若就思想啟念觀察，可以獲致較廣泛了解，並能認識來源背景，以致涵化融合關鍵。在此仍可自動力根源說起。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，對中國朝野刺激頗深。而謀求富強一念，構成思想動因。一般認識，趨向於變法改革，而語言文字乃為入手之一種。既為文字改良，即須思考創制途徑。而就參考知識基礎言，各就所學，施展所能。前節所論倡導先驅，因其與西文接觸較深，終於不約而同，循西方拼音字母而改造創制各種新字母形式。無論如何，俱以西文為參考根據。惟知識傳播，思想激盪。抑且改良語文，亦在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戊戌變法期間有奏報達於朝廷，則即語文改良一項，亦成同時期一種公開共曉之問題，自不免激起更廣泛之反應。一般由傳統語音制度方法基礎上展開改良思考，同時亦能創發若干簡化拼音制度。

依照無錫人吳曉（即吳稚暉）所自道，當知就中國固有文字語言基礎而創制拼音字母者，實以吳氏最早。即在甲午戰爭，光緒二十一年，吳氏已據篆字形制而創立一套所謂「豆芽字母」。如吳氏所述：

「就是我，也於乙未年，在蘇州吳縣教官衙門裏，當西席老夫子，依了康熙字典的等韻，做成一副豆芽字母。我的豆芽字母做成的動機：無非與以前

<sup>②</sup> 黎錦熙著：國語運動史綱，第十頁——四六頁。

教會洋人把歐母借用的如王炳耀等用簡筆或偏旁造成的，與後來沈學之十八筆，及王照之官話字母等，皆注重簡字。歷來品評音符談論音符的人，也無非把音符看做簡單的文字。即最近張（張漢卿）胡（胡樸安）諸先生的不滿意於音符，也為牠僭居文字地位，以為有諸多流弊而已。然而當時我在蘇州，施起豆芽字母之功用，卻暗合着最有用之原則。就是做出許多通俗教本，將漢文寫成，把字母注在旁邊，用通信法，教通了好幾個失學親友。」<sup>②</sup>

吳氏也可以算是第一代語文改良倡導先驅，而入手方式，則循中國文字本身思考變化。

吳氏敍言突兀，無從見其所承受之影響，惟在另一位倡導先驅王照，則有清楚自述，創意時間，啟念淵源，基本識見與設計方式，一一有所說明，出於王氏於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所著：「官話字母序」：

「戊戌秋，有福建林舍人賴存奏請用新字，詔下所司核行，未果。其時未有拼話之新字，但就福建蔡氏（錫勇）所作速記之字而言，於拼話實未適用也。余今者，偷息津門，空耗歲月。故自課以創製官話字母。閉戶掩卷，逐字審聽，口呼手畫，積數十日，考得一切字音轉變皆在喉中。喉音為總，不可與脣舌齒腭並列。凡反切之下一字，皆必用喉音。反切舊法，牽合支離，類例繁多，半真半假，徒亂人意。即西文東文各字母，亦皆喉音未備，不便採用。於是創為喉音及音母字共若干，皆假借舊字，減筆為偏旁形，概用兩拼，使愚稚易習。」<sup>③</sup>

在戊戌變法時，王照以禮部主事上書受阻，而引起撤換禮部六堂官大風波。自為變法運動中最有表現之人。思想趨新，而憂國弱民貧，抱變法改制思想。其於改良語文之創制動機，在同一序中也申說甚明，自為效法歐、美、日本，謀求國家富強起見：

「今歐美各國，教育大盛，政藝日興。以及日本號令之一，改變之速，固各有由。而初等教育言文為一，容易普及，實其至要之原。余今奉告當道者：富強治理，在各精其業，各擴其識，各知其分之齊泯。不在少數之英雋也。朝廷所應注意而急圖者宜在此也。茫茫九州，芸芸億兆，呼之不省，喚之不響。勸導禁令毫無把握，而仍舞文弄墨，襲空論以飾官名。心目中不見細

<sup>②</sup> 最近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，第三〇四頁：吳敬恒撰：「三十五年來之音符運動」。

<sup>③</sup> 王照著：小航文存，卷一，第二十九頁。

民，妄冀富強之效出於策略之轉移焉。苟不當其任，不至其時，不知其術之窮也。此可爲知者道難爲文人言也。」<sup>②</sup>

語文改良思想，亦反映出倡導者所抱持之社會有機體觀念。即欲改良語文一致之需要，而使全國週體血脉相通，呼應靈便，自亦透露出語文一致之需要。然此時當未形成所謂國語一義，以及進一步之統一語言之運動。而王照立論，則已隱示機先。可視之爲國家有機體觀念，以爲其語言統一之動機：

「今夫朝野一體，未易言也。國家與社會之關係，國家與個人之關係，社會與個人之關係，公德與私利之關係，以及人生必需之知識，其理非奧，而其緒至繁。主治者欲使人人明其大略，非有自幼漸漬之術不易收尺寸之效。世界各國之文字，皆本國人人通曉。因其文言一致，拼音簡便，雖極鈍之童，解語之年，即爲能讀文之年。以故凡有生之日，皆專於其文字所載之事理，日求精進。即文有淺深，亦隨其所研究之事理漸進於深焉耳。無論智愚貧富老幼男女，皆能執編尋繹。車夫販豎，甫定喘息，即於路旁購報紙而讀之。根基如此，故能政教畫一，氣類相通，日進無已。其朝野自然一體。而吾國則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，專有文人一格，高高在上。佔畢十年或數十年，問其所學何事。曰：學文章耳。此眞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。且魯鈍之人，或讀書半生而不能作一書柬。惟其難也，故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。稍習即輟者又十之八九。文人與眾人如兩世界。舉凡個人對於社會，對於國家，對於世界，與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識，無由傳習。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屬空談，請爲之清夜詳思，與東西各國對鏡，應知其進化難易之大相懸絕，有由然也。」<sup>③</sup>

王照（一八五九——一九三三），字小航，號水東。河北寧河人。光緒甲午年進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官禮部主事。光緒二十四年因主張變法，於政變後革職拿問，潛逃日本。光緒二十六年潛返天津，改姓趙氏。隱居爲改良文字，設計「官話字母」。嗣後以語文改良爲終身志業<sup>④</sup>。

就中國近代國語運動歷史而言，王氏實佔極重要地位。其一，王氏是承接前一期語文改良思想之啟導，而繼承發展，另闢蹊徑。由其自序可以充分見出承接前賢

② 同前書，第二八——二九頁。

③ 同前書，第二七——二八頁。

④ 黎錦熙撰：「王照傳」。國語週刊，第一二九期、一三〇期，「王小航先生專號」。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及三月二十四日刊。

見解方法，所作改途創制之努力。其二，王氏出身科甲正途，固有學術知識根底深厚。見及前有方法體制之未能盡善，遂於中國固有語文字體中設計拼音符號。此一設計，即自然走向本土化創制途中。在此一點上，王氏自是開路先驅。其三，後日國語運動之發展演變，王氏所開之路與所創制度，始終構成最早勢力與最有效之主流。即影響後世最大。雖然後人已大加改善，遠遠超過，但王氏之創造，實為全部發展之原始基礎。

至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又有勞乃宣承接王氏，依其所創官話字母，擴大而編「簡字全譜」。即將王氏官話制度，增編蘇、浙、皖、贛、閩、粵各地方言音譜，各成簡字音系。使之可以推廣至全國各省。勞氏亦具同一思想動因，即其所為根本宗旨，仍原出於謀求國家富強起見，抑且啟悟之機，亦以西方列強為本。其於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著成「簡字全譜」，自撰序文，所述甚詳：

「今之字比之古籀篆隸固為簡矣，而比之東西各國猶繁。何也？彼主聲，此主形也。主形則字多而識之難，主聲則字少而識之易。彼字易識，故識字之人多；我字難識，故識字之人少。識字者多，則民智，智則強；識字者少，則民愚，愚則弱。強弱之攸分，非以文字之難易為之本哉！然則今日而圖自強，非簡易其文字不為功矣。」<sup>③0</sup>

勞乃宣字季瑄，號玉初，又號韌叟，浙江桐鄉人。同治十年進士。曾任吳橋、清苑縣令。晚年熱心民眾識字工作，並編著簡易文字授教，信持甚堅。於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應召赴京，四月二十四日陛見，乃以同樣觀點，奏稟朝廷，並進呈「簡字全譜」，宗旨仍不外救弱圖強。適當時清廷推行變法立憲，於加強國民知識，尤所急需，其於普及教育，自然更具重大意義。

「伏惟方今時局可謂危急存亡之秋矣，有識之士，咸思所以救之。以言乎弱，則宜尚武事，然無兵學無以練兵也；以言乎貧，則宜講實業，然無農工商學無以興利也；以言乎人心偷薄，則宜重道德，然無義理之學無以興民行也。是則興學尚矣。然而幅員萬里，人民數百兆，欲教育之普及，憂憂乎其難之。中國文字奧博，字多至於數萬，通儒不能徧識。即目前日用所需，亦非數千字不足應用。學童入塾，至少必五六年始能粗通文理。貧民子弟安得有此日力。故欲人人識字，人人能受教育，必不得之數也。立憲之國，必識

<sup>③0</sup> 勞乃宣著：桐鄉勞先生遺稿，卷二，第二五頁。

字者乃得爲公民。中國鄉民有闔村無一人識字者，或有一二識字之人，適爲其村敗類，而良民轉不識字。倘比里連鄉無一人能及公民資格，何以爲立憲之始基乎。」<sup>①</sup>

一九〇〇年以後，立憲運動急遽發展，而中央以至地方，形成普遍推廣趨勢。然在實際執行與設計規章之時，實爲相當繁複牽涉甚廣之複雜工作。此一政制基礎，建立於地方自治。而地方自治，又純然自西方移植。雖然可以倣效，而在中國地方上各種情形，複雜萬端。其他姑不具論，即選舉一項亦大成問題。中國文盲眾多，構成地方自治一項困難。惟有廣泛加強教育提高民眾知識，始能推行地方自治。此實中國千古所未遇，前人所難知之一種制度，自將要歷經先知志士設想補救方法。一般議論，自然落於普及知識一途，而傳授知識之語文工具，亦自然需要加強其使用功效。於是使語文改良意願，更因實行民主政治之重大目標，而增添其嚴肅正大的理論基礎。勞氏立論，以普及教育爲立憲基礎，至此已充分形成知識普及觀念：

「竊維籌備立憲之責任，固在官吏；而實行立憲之根本，端在人民。立憲之義，在合天下人民之智識以共圖治理。若民智不開，不能自治，雖有良法美意，誰與共之。此普及教育、地方自治所以爲籌備立憲中至要之端也。」<sup>②</sup>

雖然，普及知識已爲同時代中普遍之認識，勞氏實爲代表之一。而勞氏使之結合立憲與地方自治，則使語文改良觀念更能傾服人心。同時國民教育亦即爲其普遍推行簡化語文之重點目標。勞氏所議，即爲推行識字之運動：

「地方自治爲憲政之基，若因識字人少，而自治不克依限實行，則憲政之行無所憑藉，亦將因而生阻。凡此窒礙，若不設法變通，早爲補救之計，一旦籌備屆期，而事無成效，何以仰副朝廷實行立憲之盛心。補救之計奈何，一在變通簡易識字辦法，一在變通地方自治選民資格。歐美之字，以二十六字母拼合而成。習此二十六字母，明其拼法，即可識字。字少易識，故識字者十人而九。日本文化本出於我，與我同文，用我漢字。而漢字之外，則有五

① 同前書，卷四，第一頁。

② 同前書，卷四，第五頁，宣統元年著文。

又，同前書，卷四，第六頁云：「又憲政編查館核定，民政部奏擬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：選民資格條內，男子年滿二十五歲者得爲選民，不識文字者不得爲選民各等語。夫我中國文字博大精深，儒者童而習之，皓首而不能窮其蘊。今學部力求簡要，至少之數，約爲一千六百字。已屬苦心計畫，無可再減。而猶須一年方能畢業。鄉曲小民，食力爲生，雖幼童不能無事坐食，欲其虛耗一年日力，以求識字，非稍足自給之戶不能。極貧之家斷難普及。」

十假名，拼音達意，以爲補助。士君子高深之學，必用漢字，而愚賤之人，但識假名，即能達口中之語言，明目前之事理。是以村農野老販夫走卒，皆能觀書作字。地方自治不勞而舉。我國自古以來，專用漢字，別無此項易識之字以爲補助，故惟上等之人乃能識字，國民教育難於普及愚氓。近年中國各處有志教育之士，有鑒於此，創造易識之字者不一而足。而以京師拼音官話書報社所定官話字母爲最善。」<sup>③</sup>

就語文改良運動而言，至此一時期，又更進於成熟，並且理論宗旨，亦有更新充實。除了謀求富強之首要目標外。在此第二代思想發展中，又增添教育普及觀念，乃至並亦提出語文統一問題，爲後日全面發達建立起嚴肅正大之理論基礎。此點在勞乃宣已有明顯提示：

「聞與二三知己私相討論，咸謂必合五音母韻統爲全譜。使中國同文之域，諸方之音，舉括於內。乃足爲推行全國之權輿。不揣固陋，以向所考定等韻爲本，訂爲簡字全譜一編，以質於世。於教育普及之方，言語統一之道，或不無小補云爾。」<sup>④</sup>

再次一位以本有語文條件，簡化而作注音符號者爲章炳麟。章氏原名絳，字太炎，又號炳麟，浙江餘杭人。古學淵博，尤其長於文字音韻。當清末留法學者發行「新世紀」雜誌，有人倡議廢漢字，改行萬國新語，亦即今日所謂之世界語（Esperanto），引起章氏著文反駁。章氏文中，提及所創之切音符號，亦循古文字篆籀字體，予以簡省筆畫，創爲紐文（即聲母）三十六，韻文（即韻母）二十二。俾作標示文字切音之用。其所設計理想頗與吳曉相同，紐文韻文僅只在於標注字音，並不作代替原有文字之想，而且兩人取材，亦均就古文字中已有字形作依據，實較憑空設計爲穩健易行。茲舉其所論云：

「余謂切音之用，祇在篆識字端，令本音畫然可曉，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。紐韻既繁，徒以點畫波磔粗細爲分，其形將匱；況其體勢折旋，略同今隸，易予羼入正文，誠其有不適者。故嘗定紐文爲三十六，韻文爲二十二，皆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，以代舊譜，既有典則，異於鄉壁虛造所爲，庶幾足以行遠。」<sup>⑤</sup>

<sup>③</sup> 同前書，卷四，第七——八頁。

<sup>④</sup> 同前書，卷二，第二十五頁。

<sup>⑤</sup> 尹耕：「注音符號公布前之簡字運動」，國語週刊，五十三期，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刊。又，章太炎所創紐文三十六，韻文二十二，其形體及發音解說，具見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一九二——一九六頁。

以上四位語文改良先驅可以作為第二代重要代表，除此四人之外，在同一時期，提出各種設計者尚有多人，已較前一代人數增加，並亦花樣繁多。限於資料缺略，在此只能列舉其姓名及著作大要而已。參考黎錦熙、尹耕、倪海曙三人著作，可知第二代之語文改良先驅尚有以下各人：

楊瓊、李文治，二人合著「形聲通」，光緒三十一年，日本東京印本。楊氏字絅樓，李氏字南彬，均為雲南大理人。光緒三十年在日本合創音父二十四，音母二十。光緒三十一年出版二人合著之「形聲通」一書，備為切音符號，而符號設計，純為新創，屬象徵系統。李文治自序提出其創制觀點，宗旨即為知識之普及：

「今宇內憂時之士，憫中土之顛危，慨人心之蔽塞；發憤著書，輒以開通民智為第一義。嗟乎，通豈易言哉！瀛海之隔絕也，不能不通之以汽船；大陸之阻修也，不能不通之以鐵軌。學問之事，何獨不然！文字者，學問之舟車也。」<sup>⑩</sup>

李元勳，字午樵，河南人。光緒三十一年著有「代聲術」稿本一種。以音之旁通一十二，是為韻母，音之定位二十一，是為聲母。二者排列切合，即可切音。李氏所謂：「豎綴一十二，橫排二十一，兩號相遇，一音斯成，湊合天然，忘卻人力。」其所設計符號，形體大致與漢字偏旁為近<sup>⑪</sup>。

黃虛白，字止祥，河南祥符人。宣統元年著有「漢文音和簡易識字法」。其設計符號，採文字偏旁，或受王照、勞乃宣二氏之影響，加以改進而成<sup>⑫</sup>。

劉世恩，著有「音韻記號」一書，宣統元年刻本，符號設計，自出心裁，創父音二十五，母韻二十一，兩相拼合應用，頗似滿蒙文字<sup>⑬</sup>。

馬體乾，字子良，河北三河人。著有「串音字標」，光緒三十四年稿本。又著有「最新韻府字標」，設計別出心裁，頗似甲骨文字，又似樂譜音符，介於簡單文字與圖畫之間。馬氏於知識普及觀念用心頗深，實為其創字之基本動機。如馬氏所

⑩ 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一三二頁。

⑪ 尹耕，前揭文，國語週刊，第四十六期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六日刊。

⑫ 同前書。

⑬ 尹耕，前揭文，國語週刊，第四十八期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刊。

又，「音韻記號」一書，有賀培桐序文，頗能道出普及知識之重大意義：「普通學者，增進國民普通知識之利器也。然有普通學，而無普通文字以名其學，則學仍不傳；即一般人之普通知識，亦終不彰。有普通文字，而深者足以見深，淺者不足以見淺；則雖諸子百家鋪張揚厲，亦能泄詩書之奧，發經史之光；而大多數含生負氣，億兆數萬萬之若農、若工、若商、若僧、若道，上中下九流，終難借文字之力，以化其孤陋寡聞之見，益其開明寬進之說。嗚呼，此吾國普通教育之所難講，而吾國民之所以少普通學也。」此文節錄，見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二〇七頁。

謂：

「無普通之知識，無進步之思想，無考證之能力；以致嘗於五洲大勢，與東西歷史之遺迹。一旦外交有率，莫能合民族之全體，定一致之政策以抵禦之。無非因文字繁重，求之甚難，爲之俑也。」<sup>⑩</sup>

馬氏又謂：

「我國教育不普及，人多歸咎於辦學者之不力，而余獨憫乎辦學諸公之無其器長。蓋駕飛艇者，險阻爲之坦；挽滑車者，千鈞爲之輕。孔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斯言不吾欺也。」<sup>⑪</sup>

劉孟揚，字伯年，天津人。著「天籟痕」，約與王照同時。後又改著「中國音標字書」，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，乃使用羅馬字母標音<sup>⑫</sup>。

朱文熊，江蘇崑山人，著有「江蘇新字母」一書，光緒三十二年，日本東京排印本。係用羅馬字母加造新字補其不足，用以拼切方言。其書序文，說明承襲淵源，並自出杼機之宗旨：

「原讀上海沈君（學）之切音新字，直隸王君（照）之官話字母，未嘗不歎美而稱羨之也。顧切音新字形式離奇，難於識別；官話字母取法假名，符號實多。余以爲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，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。用是採取歐文，或仍其舊音，或變其讀法，又添造六字以補其不足。凡字母三十二字，變音二字，雙聲十一字，熟音九字。變音以點爲符，雙聲合兩元音而成一音，熟音合兩僕音而成一音。上考等韻，下據反切，旁用羅馬及英文拼法，以成一種新文字，將以供我國通俗文字之用，而先試之於江蘇。」<sup>⑬</sup>

朱文熊並於所著序文，申訴其創字動機，實啟念於國家富強，教育普及。如朱氏所言：

「我國言與文相離，故教育不能普及，而國不能強盛。泰西各國，言文相合，故其文化之發達也易。日本以假名書俗話於書籍報章，故教育亦普及，而近更注意於言文一致，甚而有創廢漢字及假名、而用羅馬拼音之議者。舉國學者，如醉如狂，以研究語言文字之改良，不遺餘力。余受此刺激，不覺

⑩ 倪海曙：前揭書，一八四頁。

⑪ 同前註。

⑫ 黎錦熙著：國語運動史綱，第四五——四六頁。

又，倪海曙：前揭書，一七七——一八二頁。

⑬ 尹耕：「國語羅馬字運動的萌芽期」，國語週刊，第三十八期，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刊。

將數年來國文改良之思想，復萌於今日矣。」<sup>④4</sup>

田廷俊，字掄元，湖北江陵人。於光緒二十六年在江陵出版所著之：「數目代字訣」，是用中國通習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數目字再旁附區別小數，編製而成華碼聲母韻母。同時也另製洋碼（即阿拉伯數目字）聲母韻母。以使方便學習。其後斟酌改進，另創符號，於光緒三十二年而出版「代字訣」一書。仍用符號，但與數目字已全然不同，實是更為簡化。閱田氏前一書自序，當可見其創字動機：

「文字之繁難，中國冠天下矣。童蒙就傳三四年，不過照寫依樣之字畫，難通訓詁之意旨；試令其操觚作札，終日曳白，未知所措。統計吾華四萬萬眾，識文字者，百人中僅得數人；通文義者，千人中未見百人；無怪乎愚而且貧。試觀歐墨（美）諸邦，無論婦孺，皆能識字明理，其故何歟？良由文字簡易，書中之語，即口出之言，所以文明富強遠勝於我。方今我朝厥始維新，以造成人才為急務，勢必欲人人識文字、通文義也。無如稟賦不齊，而家計各異。倘仍不變通，敏者能識字，愚者仍不能識字，富者能識字，貧者仍不能識字。若欲愚者、貧者識字明理，非另變一種簡易新法不可。」<sup>④5</sup>

陳虬，（一八五一——一九〇三）字志三，原名國珍，晚年號蟄廬。浙江瑞安人。長於醫術，於溫州開辦醫館，同時並設學堂，教授通俗新字。於光緒二十八年出版其「新字甌文七音鐸」，又名：「普通音字新書」。同時並出版有「甌文音彙」一書，以為浙東溫州音系之簡易語文教本。陳氏創制字母，反對用外國任何字母符號，但參照西方體制，而取中國篆體、隸體分造字母。由一聲母拼一韻。陳氏書中，附有一篇：「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」，說明其創字動機：

「現今我們大清國的病呢，是坐在貧弱兩個字哪，只有富強是個對症的方兒。因此造出新字，當那富強藥方的本草。」<sup>④6</sup>

沈韶和，字構李，江蘇嘉定人。於光緒三十二年在上海出版其石印本：「新編簡字特別課本」。沈氏受勞乃宣：「合聲簡字譜」所啟發，進而改良簡化勞氏制度。自創「字母」（聲母）與「韻目」（韻母）體系。聲母二十七個，係自創六個簡單基本符號，再各用圈點區別發音。韻母三十二個，則用蘇州通用數字號碼標示。號碼由單而複，標示不同音韻<sup>④7</sup>。

④4 倪海曙：前揭書，第一五〇頁。

④5 倪海曙：前揭書，第八六頁。

④6 同前書，第一〇六頁。

④7 同前書，第一六六——一六八頁。

宋存禮（一八六二——一九一〇），字燕生，後改名恕，又改名衡。而以存禮之名上書李鴻章，提出「卑議」四篇，最負盛名。然世人沿其著作署名，多知宋恕其人。宋氏乃浙江平陽人，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著成「卑議」四篇，多為變法創制之論。光緒十八年進呈李鴻章，未受重視。萬國公報，曾載其上書全文，自為變法思想重要代表。後其「卑議」刊刻行世，題名「六齋卑議」。其中最早提出「切音文字」一語，然宋氏未即作任何創制。直至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宋氏始提出其所創切音字母，號為「宋平子新字」，模仿日本假名，另加標示點畫。此一創制，僅為草案，未及刊行，宋氏即於二年後身卒<sup>⑭</sup>。

鄭東湖，廣東香山人，宣統二年印行其所著：「切音字說明書」油印本。取漢字偏旁以為字，取詩韻中所包羅之音以為音。成三十六母音，二十父音，再加上平（陽平）、下平（陰平）、上聲、去聲、上入、下入共六個聲調符號。亦如漢字書寫，有楷書、草書二體。作用同於日本片假名，不廢漢字，而用字母注音。鄭氏創制動機，於其書中明白言之，即為迅速傳授兒童，仿習日本人民之有強烈愛國心。鄭氏認為日本民族團結愛國，即由其使用假名所陶鑄而成，比歐美之拼音文字遠為有效<sup>⑯</sup>。

江亢虎，著有「通字」，清光緒間成書。其音符純用英文字母，頗仿威妥瑪（Thomas F. Wade）制度，而四聲則用阿拉伯數字1 2 3 4標出<sup>⑰</sup>。在此必須略作說明，江氏所採英文字母拼音制度，既非創新，亦非改造，抑且在江氏之前早有眾多西洋教士紛紛編著字典，先後不下數十種，多據西文字母為基礎。迄於江氏，已有近百年歷史。而且尚可推至更早之明清之際。此間所以開列江氏著作，主要因為後日倡議國語羅馬字者，頗推尊江氏為開路前驅。以為在清末已有國語羅馬字化者。

#### 四、國語運動及其演變

語文改良活動發展至民國初年以至抗戰以前之二十餘年間，一般語文家稱為第三期，事實上，領導人物代嬗，除了少數老輩先驅，多數均為別具風格之新人。知

⑭ 同前書，第一九九——二〇〇頁。

⑯ 同前書，第二三〇——二三四頁。

⑰ 尹耕：「國語羅馬字運動的萌芽期」，國語週刊，三十八期。

識背景，思想淵源，均不同前代。就問題內容宗旨而言，尤其踵事增華，變幻歧異，有重大不同進展。就活動性質而言，已不全是私家議論提倡，而多進入於政府承擔推行中樞，成為國家一種教育目標。凡此種種，自具特色，實當稱之為第三代活動。

### 甲、推行機構之創設

語文改革活動，原只是若干時代先知自覺性之個人思想表現，雖然每人掬盡心血，思考創制，努力推行，多能產生相當效果，亦並邀得識者同情。但是終於不易推展廣遠，尤其是各出抒機，各創制度，彼此歧異，全不相干，反更難於割一。

個人推行自創文字符號，原為求其簡易速效，普及知識起見。由於力量有限，不免拘墟於極狹地域，形同一種特殊文字，只有若干學習者可以互通意念，未學者全然不曉。反而足以造成隔絕分裂，與原來期望相反。欲使真正廣行全國，自不能不由政令推行，於是自然思考到推廣之技術與方式。

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工部郎中林輅存呈請都察院代奏，請求推行切音文字，實為以政令推動改革之觀念之始。林氏推薦盧憲章、力捷三、沈學、王炳耀已在本文第二節述及，而其建議採擇，推行全國，則有詳細陳論：

「現在朝野設立大小學堂，及編譯局，所以培養人才之意，至為深厚。然字學仍舊，非用力六七年莫能稍通文理。而福建廈門近時，用盧憲章切音新法，只須半載，便能持筆抒寫其所欲言；難易之間，判若天壤。倘以盧憲章所創閩音字學新書，正以京師官音，將見皇靈所及之地，無論蒙古、西藏、青海、伊犁，以及南洋數十島國，凡華民散居之處，不數年間，書可同文，言可同音；而且婦孺皆能知書，文字因而大啟；是即合四海為一心，聯萬方為一氣也，豈不懿哉。」<sup>⑤0</sup>

林氏建議，也曾得到朝廷反響，當有諭旨批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加考驗，再行奏聞。可惜很快就有八月初之政變，此案亦被無形擋置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以後，滿清宮廷及朝野官吏頗有改革變法意圖，用以安定民心。尤以光緒二十八年以後，慈禧太后及光緒帝明詔變法，改革思想，又極度復蘇。尤其在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之日俄戰後，中國上下更是猛醒。於是南方北方在南北洋大臣端方及袁世凱主持轄區之下，地方政府已開始推行拼音言

<sup>⑤0</sup> 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六十五頁。

語教育，北方用王照所製課本，南方用勞乃宣所製課本。可代表地方政府官方力量之執行。又如前節所述，勞乃宣並由太后皇帝召見詢問，足見政府已開始注意語文改良及應用之效益<sup>52</sup>。

改良語文活動，漸次達於中央執行部門，但亦止於建議參考階段。直至清末，中央活動，至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九月資政院開會，有議員江謙質詢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事項。至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六月，學部召開「中央教育會議」，會中決定在北京設立「國語調查總會」。至此纔開始形成一個政府執行機關。但因不久爆發革命，改建共和民國，此一機構實亦無從成立<sup>53</sup>。

真正開始成立全國性語文改良機構，實已入於民國時代。在中華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七月十日，教育部在北京召集「臨時教育會議」，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。據此決議，教育部於同年十二月制訂「讀音統一會章程」。會中職權規定：其一，審定一切字音為法定國音。其二，將所有國音均析為至單至純之音素，並核定因（音）素總數。其三，采定字母，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。聘請吳稚暉（吳眺）為籌備主任。教育部並在同時先後延聘及遴派會員八十人。會員資格亦須具備以下四種特長之一。其一，精通音韻。其二，深通小學。其三，通一種或二種以上之外國文字。其四，諳多處方言。「讀音統一會」於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正式開會，會中選舉吳稚暉為議長，王照為副議長。會期進行三個月，至五月二十二日閉幕。會中展開審音調查、研討、劃一等工作，據王照的記載，可以略知其中爭論甚烈。然此一讀音會之成立，實足代表近代語文改良活動第一個全國性之行動機構<sup>54</sup>。

<sup>52</sup> 黎錦熙撰：「王照傳」。國語週刊，一二九——一三〇，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刊。

又，黎錦熙撰：「三十五年來之國語運動」。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，第三四五——三五〇頁。

<sup>53</sup> 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二一四頁、二三五頁。

<sup>54</sup> 黎錦熙著：國語運動史綱，第五十一——六五頁。

又，據前書，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所載，有「讀音統一會」全部八十名會員名單，茲附關於後：

江蘇十七人：吳敬垣（稚暉），陳懋治（仲平），汪榮寶（袞甫），顧實（鐵僧），華南圭，陸爾奎（焯士），邢島（瘦山），楊曾誥（煥芝），董瑞樞（懋堂），王崔（雲軒），白振民（振民），朱炎（炎之），謝冰（仁冰），胡雨人（雨人），黃中璽（適園），伍達（博純），朱孔彰（仲我，安徽代表。）浙江九人：胡以魯（仰曾），杜亞泉（僧父），汪怡安（一廣），馬裕藻（幼漁），錢稻孫（稻孫），朱希祖（邊先），許壽裳（季黻），楊鞠（潔臣），陳濬（子英）。直隸八人：王照（小航），王瑛（蘋山），馬體乾（子良），劉繼善（敬之），張謹（仲蘇），王修德（新邦），王儀型（式文，號希岐），陳恩榮（哲甫）。湖南四人：舒之鑑（哈上），周明珂（芷佩），李維藩（釐石），陳遂意（文會）。福建四人：盧憲章（雪樵），蔡璋（子英），林志烜，陳宗蕃（純衷）。廣東四人：鄭藻裳，羅贊勤（世芳），陳廷驥，楊輝焜（華僑代表）。湖北三人：嚴正煌（彤甫），陳曾（孝通），李折明（惺僑）。四川三人：廖平（季平），蔣言詩（志吾），王錫恩（捷三，藏代表）。廣西三人：汪鷺翔（翬庵），蒙啓謨（警民），朱資生。山東二人：張重光（紹宣），隋延瑞（輯五）。山西二人：杜耀箕（星南），蘭承榮（向青）。河南二人：陳雲路（子怡），李元勳（午樵）。陝西二人：李良材（桐軒），高樹基（培支）。甘肅二人：水梓（楚琴），楊漢公（顯澤）。安徽二人：洪達（斐齡），程良楷（子篤）。江西二人：高鯤南（翰九），徐秀鈞。奉天二人：李維楨（子棟），張德純（子文，回代表）。吉林二人：烏澤聲（謫生），王樹聲（宇清）。黑龍江二人：趙仲仁，劉湖田。雲南一人：夏瑞庚（小琅）。貴州一人：姚華（茫父）。新疆一人：蔣舉清。蒙古一人：汪海清（子瑞）。籍貫不明者一人：孫鴻哲。

至於非官方之私人活動，在民國初年亦由個人鼓吹進入於有組織時代。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，由陳懋治、陸基、董瑞椿、吳興讓、朱文熊、彭清鵬、汪懋祖、黎錦熙等人倡議，成立「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」於北京。民國六年召開第一次大會，公舉蔡元培為會長，張一麐為副會長。民國七年會員增至一千五百餘人。民國八年會員至九千八百餘人。民國九年會員至一萬二千餘人。民國十一年發行「國語月刊」。至民國十四年，因有其他政府組織承替其使命，此會至此無疾而終。「國語月刊」亦止於斯年五月。共出十五期<sup>55</sup>。

由於「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」之鼓吹倡議，教育部於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四月十一日正式成立永久性附屬機構：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。重拾「讀音統一會」之工作，繼續推動。教育部為此先後指派延聘會員達一百二十四人。重要人士則有：黎錦熙、陳懋治、沈頤、李步青、陸基、朱文熊、錢稻孫、錢玄同、胡適、劉復、周作人、馬裕藻、趙元任、汪怡、蔡元培、白鎮瀛、蕭家霖、曾彝進、孫世慶、方毅、沈兼士、黎錦暉、許地山、林語堂、王璞等。同時指定會長張一麐，副會長袁希濤、吳稚暉<sup>56</sup>。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即為常設機構，有一定職司。實為語文改良活動安全進入於國家固定職責範圍。承擔全般語文工作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十二月十二日，教育部又正式制定規程，設立「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」。經常策劃主持國語教育工作。同時聘定委員蔡元培、張一麐、吳敬恆（稚暉）、李煜瀛、李書華、錢玄同、黎錦熙、陳懋治、汪怡、胡適、劉復、周作人、李步青、沈頤、陸基、朱文熊、魏建功、曾彝進、孫世慶、方毅、沈兼士、黎錦暉、趙元任、許地山、白鎮瀛、林語堂、任鴻雋、馬體乾、錢稻孫、馬裕藻、蕭家霖凡卅一人。並聘定吳敬恆為主席，錢玄同、黎錦熙、陳懋治、汪怡、沈頤、白鎮瀛、魏建功七人為常務委員。又由會約請趙元任、蕭家霖加入常委。嗣後連次發行「國語旬刊」（民國十八年）及「國語周刊」（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）使全國國語統一運動進入於最穩定及有效時期<sup>57</sup>。

## 乙、觀念之演變

第三代思想，上承富強觀念踵事增華。然此原始動機已逐漸消退少見。而知識

<sup>55</sup> 同前書，第六十六——七十四頁。

<sup>56</sup> 同前書，第八十二——八十三頁。

<sup>57</sup> 黎錦熙撰：「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最近六年紀略」，國語週刊，第一三八期——一四四期，民國二十三年五月——六月。

普化觀念則追隨前一時期更加日趨擴張。此一知識普化動因，形成普及教育觀念，至第三代更得以廣泛發展，內容已進入多項複雜之宗旨。終於自然產生三個重大分化途徑，分投各趨於一重大領域。第一枝途徑，循普及教育宗旨，形成近代嚴肅之教育目標。此後之種種教育思潮以及理論體制，以至於教育宗旨與制度，均承普及教育為基本動因。第二枝途徑，循行通俗文學途徑，進入文學思潮領域，醞釀出此後種種文學理論宗旨之演變，相激相盪，發展而成各色各體之文學運動。第三枝途徑，則仍為知識普化工具之語文改良問題。經過前代先驅之倡導啟牖，至第二代已形成普遍運動。抒論之專家逾百，參與活動者逾萬。影響所及，進入教育體制之中，足以推動全國性之實踐。前二種途徑，在此無從詳論。而就語文改良活動一端而言，此一階段自是一個較長期之運動潮峯。同時也是由思想進展入於重要行動時期。

此一時期思想中心之一，即為廣泛應用「國語」一個概念。「國語」一詞之簡明定義，即為全國性國家公用語言之意。此一詞彙之生成背景，頗有明晰淵源。最重要根本之「國語」之觀念，啟導於民族主義思想，原並不始於「國語」一詞，在先實有更正大更莊嚴詞彙。至少至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「保國會」之成立，即達於成熟，抑且足以代表民族主義思想之鮮明標幟。「保國會章程」中清楚立為重大條項，其重要宗旨，即在於保全「國地」、「國民」、「國教」。自此以後，「國」之詞意更作廣泛應用，足見民族主義思想之日漸擴大。「國語」一詞實為其所衍生之一種概念。

「國語」一詞，除往昔專指滿文之特殊用途，是另具其定義之外。近代之所謂「國語」，自明確表示出 *national* 之意。最早出現文字，當在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京師大學堂學生何鳳華、王用舟、劉奇峯、張官雲、世英、祥懋等六人，上書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。呈文標目有謂：「請奏明頒行官話字母，設普通國語學科，以開民智而救大局。」提具理由，實為謀國家求智求強之計：

「今世界之教育，為多數之人，合羣策羣力以捍衛國家而設，非為求譯才而已也。夫吾國不欲自強、不欲開民智則已，如欲開民智以自強，非使人人能讀書，人人能識字，人人能閱報章，人人能解詔書示諭不可。雖然時至今日，談何容易，非有言文合一、字母簡便之法不可。彼歐美諸邦，所以致強之源，固非一端，而其言文合一，字母簡便，實其本也。」<sup>58</sup>

<sup>58</sup> 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，第一〇〇頁。

何鳳華等人對於推行簡便字母，並申述其五點有利宗旨：其一，統一語言以結團體。其二，畫一名詞以省腦力。其三，講女學以強種族。其四，訓軍士以明武略。其五，輔學堂而先收效。五者之中，統一語言尤當為重大目標。嗣後成為國語運動長期不變之重點。

「國語統一」一詞之連屬，見於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所刊朱文熊所著：「江蘇新字母」自序：

「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，能自立於生存競爭之世界耳。顧文字不易，教育總不能普及；國語不一，團結總不能堅固。此文字乃中國文字之改革，而先試之於江蘇者也。江蘇以蘇州為省會之一，故以蘇音為標準，他日國語統一之目的能達，則此字母及拼法雖可用，而表音上所著之國字，不得不更定矣。」<sup>59</sup>

至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，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，由張謇任正會長，張元濟、傅增湘任副會長，學部大臣交議各案之中，即有「國語音韻釋例」一案。另外又有會員王劭廉等提出：「統一國語辦法案」，於閏六月十六日（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）在第十六次會議中多數通過。案中決定在京城設立「國語調查總會」，已可見出執行決心。惟因不久爆發革命，清政府之官方行動亦止於此次決議而已。然「國語統一觀念」，至此實已更加確定<sup>60</sup>。

「國語統一」觀念，創生於清末最後數年，入於民國，則更逐漸展開「國語統一運動」。民國以來，關心者最多，人才最盛，辯論研討最為深入。再加教育部門之專職專業人員。由思想已形成制度，由制度而創設機構，由機構而展開功令，由功令而施行種種教材、學程、訓練、方法，於是再而綜攝構造一代運動之綱領。充分顯示國語運動之蓬勃發展。

語音統一觀念啟於清末，「國音」一詞則由國語音韻轉化而來，成為民初以迄今茲之通行詞彙，實為國語運動中誕生之重要概念。民國二年之讀音統一會即為確立國音觀念之重要實踐。為具體而準確核定國音體系之領域，自然而使萬流歸一，自光緒二十二年以來之一切創制，統化而歸趨一途。於是而有民國初年「國音字母」之創生。大致形成，多循王照、勞乃宣所建注音體系。建制過程，經歷多數語言專家思考研究辯論爭持而最後形成。其中幾近半數採用章太炎所定之字母。正

59 同前書，第一五二頁。

60 同前書，第二三五——二三六頁。



思想開啟之後，學術建樹，思慮尤進於縝密。歷經多次研考爭辯，又達於政府功令。原來行用「國音字母」及「注音字母」名稱，學人以為不妥，而經國民政府決定，於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四月二十九日，正式改注音字母為「注音符號」。是即形成日後長期沿用名詞。不久，又由教育部於同年五月二十一日，公布組織「注音符號推行委員會」，由是而分別成立中央及各省之推行委員會，以執行推動全國注音教育，而國語統一運動已達於最穩定之成功階段<sup>62</sup>。

國語運動，發展至此一期積極行動與十分穩定階段，由於累年經驗與多次論辯，思想醞釀，終構成嚴密體系，民國十五年一月，由始終從事實際推行工作之黎錦熙提出國語運動綱領。是所謂：兩綱、四目、十件事。於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，再次修正，刊登於「國語週刊」第三期：

何謂兩綱？一曰國語統一；二曰國語普及。——當然，要有言文一致的國語，這種國語才能普及，所以第二綱又可換言之為「言文一致」。

何謂四目？因為國語統一含有兩種意義：一曰統一；二曰不統一。國語普及也含有兩種意義：一曰普及；二曰不普及。

現在就這兩綱四目，把我們應幹的工作，具體地寫出來，凡十件事：

第一綱：國語統一

第一目：統一

（一）努力宣傳並多方推行國音字母——國音字母現有兩式：第一式就是注音符號，兒童和一般民眾用之；第二式就是國語羅馬字，受高小教育以上的添用之。

（二）提倡傳習國語標準語和國語文（北平語就是標準語底代表；普通白話文就是國語文底基礎）。

第二目：不統一

（三）添製閩音字母——閩音字母是用來標國音所沒有而各地特有之方言的。

（四）調查方言——兼整理、實驗，並尋討源流，這是學術上底任務。

（五）徵集並改良方言文學——這兼是社會教育上底任務。

第二綱：國語普及（言文一致）

第三目：普及

62 黎錦熙著：國語運動史綱，第二三——二三七頁。

(六) 提倡漢字注音——國音和閩音兼注，叫現在的民眾容易識字，人人略能讀書閱報。

(七) 主張漢字外通行一種國語標音字——這當然是國語羅馬字，用來增高並擴大將來教育底工具愈趨簡便，則文化容易普及而提高。

以上兩事，具體的方法在努力編譯讀物（譯者譯西爲中；譯古爲今）。

(八) 建設國語的新文學——兼重內容思想和歷史。

#### 第四目：不普及

(九) 紿漢字、古文，和國故以相當的地位——一方面，精選慎擇，不讓牠們再亂七八糟地增加中等教育上底困厄，一方面讓專門學者儘量地作科學的整理和真實的探求。

(十) 編纂大規模的辭典——結算四千年來國語（文字和語言及其所包的一切新舊學術文化等）的總賬。

這就是國語界同志們今後的目標。看起來，範圍未免太大了罷？但若無第一綱，則無創造性；若無第二綱，則無革命性。若無一三兩目，則不能普遍化（常識化）；若無二四兩目，則不能學術化，則其道不尊；不普遍化，則其道不廣。故不得不同時十事，並駕兼營；不貪「急功」亦收「近效」<sup>◎</sup>。

黎氏果爲第三代國語運動重要領袖，所提綱領，實已包羅民國以來全面活動宗旨，足以代表此一階段中心思想。

在此必須對於另一系統發展作一述論，是即民國以來之國語羅馬字運動。因爲這對後世頗有深遠影響。

自公元一世紀佛教輸入，因譯佛經方法，自然習染梵文拼音制度，遂演進而成中國之切音法，輾轉發明，相沿而及於現代。此爲歷史上顯著事實。惟至明季西洋耶穌會士紛紛來華，又將拉丁字母介紹進來，其中正式用於拼注中國文字者，則有教士金尼閣 (Nicholas Trigault) 所著之「西儒耳目資」(*Vocabulaire Chinois*)，其稿本三卷，成於一六二〇年。當是中國最早之一部華文拉丁字典，備西人以識中國文字。金氏用拉丁字母，爲中國語音定出五個「自鳴」音，亦即元音或母音；二十個「同鳴」音，亦即輔音或子音。兩者互相合拼，即可拼成中國所有字音。其所須重視者，實爲對中國切音制度產生一次重大改變。因爲在當時一些中國學者如方

◎ 國語週刊，第三期，北京，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刊。

以智、劉獻廷、楊選杞等，均受其影響，而吸取其方法改進中國切音<sup>④</sup>。

降至十九世紀，西洋教士來華傳教者日眾。每人必須接觸中國語言文字，各為入門方便之計，往往據西方固有工具，研擬而創制一套拼音制度。抑且各地方言不同，往往又各成不同音系之語文拼音字典。如客家方言、湖南方言、福州方言、上海方言、廣東方言、汕頭方言等等語文字典之著作。不惟各家音系不同，而拼音方式及符號，也彼此多有出入。此類出於西洋教士之不同創作，或有互相因襲之處，而實際則仍不免五花八門。惟一相同者，厥為無一不用西方共用之拉丁字母，後世則謂其所承襲之拼音羅馬字。此種種字書，可查出書名者，約計不下一百餘種<sup>⑤</sup>。此類拉丁字母或英文字母所成之拼音文字，在十九世紀基督教教學及婦女識字方面，曾被廣泛推行。而其成效亦止限於聖經講授以及中國教徒與教士之溝通。無論教士與中國信徒，均感頗有局限<sup>⑥</sup>。

適如第二節所論，西洋教士一時各類字書，正足以啟示中國學者取法與創作。因是而有第一代語文改革家之種種貢獻。第一代過去，經過若干學者之本土化創制，以至最後公布一套國音字母。俱就中國文字自身取材，而捨棄拉丁字母。但在第三代推行注音字母同時，亦使羅馬字制度頗為流行。

雖然近代語言專家可將羅馬拼音字淵源上推很早，實則形成一種運動，為一些人大力推動者則為第三代之民國時期。其勢力不及注音字母之廣為推行，但為若干學者倡導鼓吹。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九月，一時語言學者組織「數人會」，會員林語堂、趙元任、錢玄同、黎錦熙、劉半儂、汪怡等，設計羅馬字拼音制度。同會之中，即有數個不同方案。嗣後數人即是最顯著以推行羅馬字著名。同時，由於諸人全為教育部所聘國語統一籌備會委員，自然極力做成提案由教育部議決執行。是以在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即由大學院（等於教育部）就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所制定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」，明令公布施行，與前此之注音字母並行使用<sup>⑦</sup>。

羅馬字拼音制度，原止用於為中國文字注音，大多數西方製作之字書多在於此。而近世在中國境內則發展至於代替中國字之主張。此一思想來源，頗為複雜。基本上，如西洋教士之教育文盲，即在於廣為普及。再進一層，則比較西方富強在

④ 同前書，第一一一期，羅常培撰：「國音字母以前的音標運動」，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刊。  
又，同前書，第一〇五期至一〇六期，胡英撰：「三百五十年來在中國的羅馬字拼音紀略」，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刊。

⑤ 王爾敏編：中國文獻西譯書目，第四三四——四六四頁。

⑥ 梁家麟著：清季廣東之基督教教育，一九八二年稿本。

⑦ 黎錦熙著：國語運動史綱，第一五七——一七五頁。

於使用拼音文字。再進一層，則為推動語言文字之合一。再進一層，則認定可以拼音文字順利納入於機械化、電腦化。於是種種衝擊，推動思潮波浪起伏。同樣亦達於政令之強制施行。近三十年大陸政權之全面推展文字改革即其實例。然而中外爭論，亦是激盪不息。

## 五、結論

中國近代語文改良動機，啟於謀求富強意念，已見各家廣泛論說，自不待言。同時由於力求知識普及平民，志在提高人民知識水準。就思想醒覺言，亦正契合近代興起之民權思想。對於民眾力量價值地位之重視，以及喚起民眾之努力，並於此以見國與民之真正密切關係。均足顯示知識普化觀念之重大意義。此種崇高理想及基本方向，十分正確，實可稱為近代之知識普化運動。

各家所創語文改良制度與工具，大致可分為三項途徑。其一，借資西方已成之形式。其二，借資中國固有之文字。其三，憑空另造符號。歷經長期醞釀與反覆研討。終以中國本土文字改成符號最受重視。其次，則一些曾游學外國學者，又多數主張逕用羅馬字拼音。雖然如此，直至一九三〇年代，廣泛推行者仍不外止於輔助識字，用為注音之用。不過以符號完全代替文字之主張，同時期亦屢屢出現，尤其第三代新起一派留學西洋學者，大力主張改用羅馬字代替漢字。思想之分化歧異發展，並有主張廢漢字改用「世界語」者。光緒三十四年留法學生於「新世紀」雜誌有所主張，當時即引起章太炎反駁。「新世紀」並再有所爭論。然在國內激起反響較少<sup>⑧</sup>。

所謂「世界語」，是西方自拉丁文簡化創造之制度。中國學者譯為「愛斯不難讀」(Esperanto)。但百餘年來，仍然流傳不廣，而且極少人用。直是等於閉門造車，今日最不能通行於世界者即為「世界語」，惟在民國初年有一些語言學家略作介紹<sup>⑨</sup>。

至於提倡國語者，宜重在國本，即本國國家之語言，長期累積習慣不可輕忽。

<sup>⑧</sup> 倪海曙著：清末漢語運動編年史，一八五——一九〇頁；一九六——一九九頁。

<sup>⑨</sup> 十年前我曾自臺北開明書店購得世界語字典一冊，世界語課本一冊。目的並非要學習，只是要多少了解其情形。但一見則知仍用拉丁文之字母以及連書長短不同文字，只是拼音簡單，記憶則與任何西文相同。而字母編排，既非拉丁文又非任何一國文字，直是天地間驟然多此一種語言文字，而於地球之上無一地可以行用。我來香港中文大學任教，即將兩書帶來贈予同事朱立先生。

一國語言形成，乃文化風俗長期累積產物，包括語言、思想、信仰、習慣、意趣、民性無不蘊蓄其中，實為極其複雜之綜合體，全民依賴習用，不能一日缺少。近世輕言改造，前提在謂固有文字複雜難識，西方列強俱用拼音文字，以為中國文字書寫緩慢，無由與列強競爭。此種見地，不無理由，其所以能風靡一時者，亦在於有相當說服力。然而在心理上適正反映國人民族自信之崩潰，此點正為近人思考所忽略，實為一危險訊號。即顯示中華民族思想意志信心之根本動搖。一民族之形成壯大，在於一民族之團結融合，本來建基於感情，原非出於理性。若以理性之強制安排，加以改變，雖收小效，必致大損。況既使拉丁化，實乃取徑於語言之西化。彼之工具為彼民族文化長期形成，我之工具，因我之民族文化長期形成。工具各因其特殊需要而創生。事物不同，工具各遂其所長。劍有所鈍而斧有利，主要在於施用之對象。中國語文特色，以文字統攝語言，故方言雖多，卻仍能通達聲氣維持統一。若使用西方字母，則必隨語言變化而日趨歧異分裂。即以中古法德二國之形成可為實例，可為前鑑。茲舉西方史書如次：

「然有一極重要之分裂發生其間，蓋入居羅馬高盧之西法蘭克人，從其所征服之民習得一種駭雜之拉丁語，遂化於羅馬；至於來因蘭之法蘭克人則仍保持其下日耳曼語也。言語不同，在文明程度低下之時，每能在政治上生極強之影響。一百五十年間，法蘭克人之世界分裂為二，一為紐斯的里亞（Neustria），即法蘭西之雛形，操一種類似拉丁之語言，卒成今日吾人所見之法語。一為奧斯達拉西亞（Austrasia），即來因蘭也，則仍操日耳曼語。」<sup>70</sup>古昔法德本為同一民族，由於中古語文之分化，一百五十年間乃形成二個不同民族。近世二百餘年，法德世仇，戰火連年不息，誰為厲階？凡我學人豈可不作深思審慮？

若以改行拉丁文字，以求速效而進至於富強者，其說十分動人。然亦視事太易。孟浪行之，後果難測。中國近鄰未嘗不有二三實例，何不取而比較觀察？越南自公元前二世紀已為中國郡縣，前後達一千餘年。行用漢字崇祀孔廟與中國同，而近世立意求強，先靠法國，全國改以法國字母拼其土音。文字西化，早於中國，久為先驅，百年行用，與強何關？求強固未能得，而民族信心喪失，自立精神蕩然。徒為帝國主義者因勢乘便，多製造一批服役奴才，效命走狗。先後依附投靠法國、美國、俄國，何嘗計及亡國滅種之痛，真是哀莫大於心死。越人與中華血緣最近，

<sup>70</sup> 韋爾斯（H. G. Wells）：世界史綱，下冊，第五四一頁。

不能不哀憫其悲慘國運，亦應當借取其前車可鑑。

中國語言文字之微，其改革動機亦與求強一念息息相關，今舉文證人證，無慮數十，當無疑問。現時早已進入語文專門之學，原始動機，相疏日遠，相忘日久。不知追考，不求細察。須知拼音文字字母，世上甚多，印度一國即有十四種。而久為列強所奴役，何關乎國家富強？我國學者何以獨鍾情於拉丁字母？說穿一句話，乃因歐美皆強國，中國人多往留學而熟習其文字而已。求強之一念隱在其中。再舉一例，頗可參考深思。即民國初年研訂國音字母學者爭論殊多。當時吳稚暉堅持採用十三濁音，雖多人反對而不能決。吳氏理由，即謂德國語文濁音最多，其國盛民強即在於此，爭執不下。及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頒布國音字母之時，德國已在歐戰中戰敗。濁音之氣焰大消，終於在字母中僅採用三個濁音字母。由此一端，已可想見國人在如何傾慕歐美強國語文<sup>①</sup>。

附記：本文之撰著承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輔導處提供研究助理，謹記感謝之意。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三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

① 王熙：小航文存，卷一，第四十七頁：「吳某（吳稚暉）提議三十六字母中之十三個濁音，必須加入新字母。余（王熙）反對之。北十餘省及蒙藏川滇代表皆與余一致，蘇人之江寧以北者亦不助吳某。因十三濁音母，除蘇淞常杭嘉湖數十縣人外皆不能讀也。連日爭論極烈，吳某百計巧辯，謂濁音字雄壯，為中國之元氣。且言德文濁音字多，故德國強盛。吾國不強，因官話不用濁音之故。有時吳於主席位上大唱弋陽腔。令衆人審聽其濁音字之雄壯。」

